

第一章 军事战略的时代特征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说：“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见《列宁全集》中译本，第21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就无法准确地判断自己国家所处的战略环境，无法研究和制定与之相应的战略。

列宁认为，所谓时代，是指人们对世界形势的最高层次的判断，是种种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大的和小的、先进国家和非先进国家的全部固有的现象的总和。具体地讲，划分时代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四点：

- ①正确判断构成该时代中心内容的政治力量之所在；
- ②正确判断该时代的主要内涵；
- ③正确判断该时代发展的基本方向；
- ④正确判断该时代的历史背景。

由上可知，研究时代特征，就是要着重考察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内容。

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的时代特征是什么？通过对美、苏、中三大国领导人观点的比较，可以明确这一点。

众所周知，在当代美国总统中，第 37 任总统尼克松是最具代表性的、擅长于外交事务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他具有从全球战略角度分析国际问题的卓越能力。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美国得以摆脱越南战争的阴影，打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封闭达 23 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在任期内还通过与前苏联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晤，打下了改善美苏关系的基础。尼克松在退任后会专心写作，发表了许多著作，阐述他对时代的认识及其做法。他指出：“我们必须使 21 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真正的和平不是冲突的结束，而是在冲突中生活的一种方式”。国际争端在地球上已经持续数百年，国与国之间由于政治传统、历史经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极大差异，不断发生冲突。换言之，国家利益间的矛盾导致了争执与冲突，最终引发战争。只有各个国家承认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并力求控制冲突，保持力量的均衡，才能使和平的时代得以延续、持久。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讲：“真正的和平是一个过程——一个在相互竞争的各国、各种制度及各种国际野心之间处理和抑制冲突的持续过程。这是有史以来存在过的唯一的和平方式，也是我们能现实主义的争取获得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提出的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任务与职责是：处理冲突，使之不致酿成战争，而不要企图根除一切冲突，因为那样做是徒劳的。“使一切潜在的侵略者认识到侵略无益，我们的目标是必须使战争让人无利可图”（见尼克松《1999. 不战而胜》中译本，长征出版社，1988 年）

同样，里根任总统时期的美国政府继续执行对苏缓和政策，使美苏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而布什上台后发

表的演讲指出：“东西方关系的变化已经与过去（70年代）的缓和有着本质区别，40年来坚韧不拔的努力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宝贵的机会，现在是超越遏制而制定一项90年代的新政策的时候了——这项新政策充分认识到全世界和苏联本身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布什1989年5月12日在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的讲话）

1987年苏联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力作，充分反映了戈氏的理论思维和政治观点，对其后的苏联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戈尔巴乔夫本人已在苏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败北，现在的苏联已被“独立国家联合体”所替代，但《改革与新思维》仍可作为研究苏联解体前后国家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戈氏在该书中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他对时代的认识。“尽管当代世界矛盾重重，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尽管各国人民在不同时期作出的选择各不相同，但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地球这条船上的乘客，不能让这条船翻沉。第二艘诺亚方舟是不会有。”“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因此，新的政治思维十分严格地规定了军事理论的性质。它应是绝对防御性的。”

戈尔巴乔夫的核心思想内容为“人类生存利益高于一切”。各国哲学界和新的思维不应把民族的或地区的利益摆在前面，而应把全人类的利益摆在前面；为了全体性任务的解决，不同政治制度和体系的国家应当而且能够彼此合作；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的道路；是裁军的道路；裁军谈判不是一场赌输赢的赌博，赢家应当是大家，否则大家都要输掉；安全是不能分割的，或者都有，或者都没有；国际政治的天平已向全人类共同利益倾斜，意识形态退居次要地位。他呼吁各国政治家寻求“非常健全的思维和智慧，以便克服各种矛盾和过去的一切积怨，帮助人类渡过危机”，“我们一定要学会在和平中生活”。这种新思维应该说对解体前的苏联政治造成极大影响，大家普遍认为，正是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结束了阿富汗战争，并从阿富汗全部撤军；改善中苏关系，撤回驻蒙苏军；从东欧部分撤军；改变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本态度，积极改善苏日与苏韩关系等。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指导下的国民经济发展势必受到诸多影响。但自 70 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总体看法有了变化，逐渐认识到世界大战有可能被推迟。邓小平在 1984 年 2 月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想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解决。”“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是一心

一意搞四化建设，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后来，邓小平把上述思想归纳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政治报告，正式用“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来表述时代特征。

从上可以看出，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应朝向和平发展方向努力。

第一节 世界走向新时代

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我们知道，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因素，所谓“生产力”，是指人类拥有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它又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国家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可以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因为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把社会生产力推向前进，从而不可避免地将人类文明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18

世纪起源于美国的产业革命，即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就是一次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使人类第一次以机械力代替体力劳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蒸汽机时代。19 世纪 70 年代发生的以电和磁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科学技术进步，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能源——电能，开创了又一个新的电力时代。而本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其深度和广度又是过去难以比拟的。1942 年建成第一座核反应堆，1955 年建成第一座商用核电站，从此宣告人类进入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时代。到了 70 年代，现代科学技术又进入一个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即微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在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工程、宇航工程、通信技术等方面形成综合性的科学技术群。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发展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它既为处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各国提供了振兴、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世界性的、全方位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均受到强烈影响。

1. 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往的“机器”只是人手的延长，如纺纱机、蒸汽机等，而如今的机械已成为人脑的扩大，如电子计算机等，这是一项质的飞跃，并且以极快的速度继续在发展。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也是加速度发展的趋势。科学技术知识量按指数速度增长，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周期不断缩短。而这些

都对生产体系的结构乃至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兴的信息产业已经形成，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和智力的社会地位日益显得重要。而人类面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生存威胁，如温室效应、环境污染、人口过快增长、生态失衡、土地沙化、生物灭绝，也只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加以解决。

2. 科学技术的进步程度决定国家的综合国力

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西方军事理论家就提出“大战略”的理论，即协调和指导国家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认识到战争的胜败并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力量，而是主要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力量。所以，美国军事理论家认为，国家战略是指在平时和战时使用军事力量的同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未来的 21 世纪将是科学技术决定综合国力的世纪，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高度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竞相发展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重点。进入 80 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制定了以高科技进步提高综合国力的发展规划。1983 年，美国政府宣布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和以太空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高边疆战略”，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优势，既要大大加强美国的国防力量，又要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要提高其国际地位；欧洲共同体也宣布实施“尤里卡计划”、“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等；前苏联确

定了“加速发展战略”，并与经互会各国签署了“科技进步综合纲要”；日本更是在“科技立国”的国策指导下，宣布了“新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计划”和“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中国公布了代号为“863 工程”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印度也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

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还体现于军事实力的较量，90 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短短 43 天的战争期间，几乎使用了常规武器库的所有最先进武器装备，从太空到地面直至水下，构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激烈对抗。结果表明，新旧武器之间的战场效应差距正在急剧地扩大。事实证明：谁在科学技术上落后，谁就将在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高新技术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3. 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存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共同财富，它的国际间交流与超国界发展是必然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合作也越来越多。其实，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有所说明。一名制作别针的熟练工匠，如果全部工序都由自己操作，每天最多可生产 28 个别针，而拥有 10 名工匠的作坊把制作别针的工序分解为 18 道，则每天能生产 48000 多个，平均每名工匠生产 4800 个别针。1990 年版《日本科学技术白皮书》提出的大型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有：太空站、热核聚变、超导超大型对撞式加速器等，该白皮书承认，从庞大的资金需求和人才、技术的观点来看，由一国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困难越来越多，通过国际合作加速科研进

程已显十分必要。

同时，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必然遇到与国家利益不一致、发生冲突的问题，这种矛盾和冲突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例如，自 70 年代以来，美国主宰世界科技的地位就受到日本的强有力挑战。据资料显示，目前日本在半导体和机器人的研制方面已超过美国，在电子计算机、办公室自动化、通讯技术、生物技术和制药等领域也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日本占据着一半以上的世界集成电路市场，且不断推出新产品。

二、经济发展互惠互利

经济集团化正在成为世界性大趋势，当今世界内，各国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日益密切，相互联系程度不断加深，已形成“互相交织、互相依赖”的互惠互利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各国经济都被卷入国际市场的大潮之中，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全力发展自己的商品经济，都需要建立和扩大统一的世界大市场，从而使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中、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都是合乎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的必然发展，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国愿意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共同推动商品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应该说，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必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迎来中国乃至周边相关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向新的

时代发展。

时代发展到今天，各种各样的经济联合体日益兴起。所谓经济集团化，我的理解主要包含以下内容：打破国界的限制；构成一定的契约关系；追求集团内部共同发展；互相提供特别的优惠条件；在一定范围内的双边排他性合作。

世界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是构成经济集团的自然原因。而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发达，又为经济集团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地缘关系也在集团化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现在的经济集团不仅着眼于增强内部的经济活力，还全力开展对外贸易，从而对世界经济整体发展产生良性效应。最典型的范例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多年来，其成员国之间贸易的直线上升，给各国都带来巨大的经济实惠。由于欧洲是高科技、大工业基地和国际贸易的中心地之一，所以对世界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增长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而言，一方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有时甚至可能出现尖锐激烈的对抗；一方面必须加强联系与交往，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发展本国经济。这也是生产社会化本身的需求，这种本质上的依存关系只会加深而不会减弱。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都不能不受到全球经济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得失成败，都将取决于该国参与和利用世界经济环境的程度。这种以国际化分工为特点的经济集团化趋势不可逆转。

经济集团化的进程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面貌，而且也影响到国际政治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生产部门在战争需求的刺激下急剧膨胀，经济实力空前增强，到

战后初期号称“金元帝国”，在世界经济中雄居首位，因此当时的美国能左右国际政治局势。而苏联经济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受巨大损失，但战后获得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与保、匈、波、罗、捷、阿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组成“经济互助委员会”，使得苏联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快的高速增长，使苏联能尽快成为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的经济中心，成为另一个经济大国，整个世界政治随之进入美苏并存、相互抗衡的“两极化”格局。总之，经济集团化导致国际政治关系的重新排列组合，成为世界经济多极化的经济基础，而世界政治多极化则是它的必然结果。

三、政治矛盾趋向缓和

进入 80 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发生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线依然存在。随着苏联解体、两个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的解散，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美国成为现在的唯一超级大国，俄罗斯为全力解决国内矛盾，实行全球性战略收缩，世界政治的影响力大大减弱。

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严峻的振兴经济和社会发 展问题，当务之急是摆脱落后和贫困面貌，由于对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需求，使发达国家在南北关系中稳操战略主动权。

靠发动战争来谋取高额经济利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历史发展到今天，发达国家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保持长期的繁荣与稳

定。因此，我们认为，在多数西方国家中，军国主义政策及法西斯化的可能性日趋减少，国家内部制约战争的因素都在不断增长。尤其是随着经济集团化的加深，国家之间利益的相互交错，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扩大，加上国民政治意识的提高，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已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相反，国际经济合作带来的新问题是，经济合作越紧密，造成矛盾的机会就越多，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面临新的挑战。如金融一体化、股市、投资及贸易国际化、经贸区域化格局的出现，使一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对抗日益激烈，甚至达到爆发“经济战争”的严重程度。

70年代以来，许多美国人对日本巨额资本在美国国内的渗透深表不安，担心来自日本的经济进攻最终使“美国将被日本买去”。据日本《产经新闻》1991年6月20日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委托有关专家撰写了题为《日本在2000年》的研究报告，从日本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行为规范、国民意识等不同角度剖析了日本的发展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日本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圈的成员，提供各种经济优惠、援助，使日本经济得以很快恢复并取得高速发展。但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它开始违反贸易平衡的西方国家行为准则，日本在1990年甚至公然宣称“贸易不平衡责任在美国”。据美国专家分析，日本的“经济掠夺”战略包括：一、控制外国的特定市场和技术；二、要求美国市场对日本开放；三、压制对日本的批评意见；四、影响美国的贸易政策。目前日本在微电子和半导体领域内称霸世界的状况已十分明显，美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也正在加深。但日本并不满足，日本的目标是

要控制整个世界经济，“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已开始死灰复燃，日本一贯以经济统治的观点来看待国家安全保障，日本目前正利用经济力量把自己的政治意图施加给别人，经济已经取代军事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武器。日本的实力不在军事上，而是来自知识和信息技术。该报告呼吁美国人“应该团结起来，抵御日本的威胁，同时还应该警惕日本趁机取代同盟伙伴的企图。对美国来说，目前正面临和 2000 年前独立战争时一样的危险。日本经济正在危及美国的生活方式，所有美国人都要注意日本这颗上升的太阳的突然袭击，因为进攻已经开始了”。

我们必须看到，在相对和平条件下国与国之间所发生的经济竞争并未引起诸多人们的警惕。人们依循以政治军事安全为标志的国家安全意识，还没有看清经济国际化对传统国家安全观念的冲击。我们既不能为了维护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而将本国孤立于世界经济合作阵营之外，也不能无视经济竞争给国家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为此，除了通过改革，适应新时代、新情况、新形势，别无其他选择。

第二节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旋律

一、什么是和平？

我们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来源于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认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 60 年代曾坚持认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有四个：一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国内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

盾；三是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四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是战争与革命。而迄今为止已经持续 40 多年的世界主体和平的事实，无情地证明了这一认识的错误。中国终于向世界表明了自己的新观点：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

当然，所谓和平是指世界大范围的相对和平，尽管发生过一系列局部战争与军事冲突，但世界大战毕竟没有再发生，今后仍可能限制或者是推迟。从另一种角度来讲，发展是指综合国力的提高，发展本身就是一场优胜劣汰的大竞争，失败者将被历史所淘汰，苏联的解体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国内发生经济危机。

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没有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经济和社会发展便失去基本保障，不可能取得发展。反言之，没有经济发展，到处是饥荒和贫穷，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就孕育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动乱，而这种动乱，势必给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冲击，所以说，维护世界和平不是空话，要求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采取实际行动，承担更多义务。只有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开发，人类社会才能进步。

二、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新态势

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旋律，世界形势正经历着战后以来的最大变化，随着冷战结束，维持近半个世纪的“雅尔塔格局”崩溃，世界进入建立新国际格局的更迭期。总的来看，当前国际战略形势有如下特点：

1. 多极化格局已现端倪。美国虽然竭力想领导世界新秩序，但 90 年代以来经历的经济衰退、海湾战争等风波使其认识到已经是力不从心。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国际新秩序无法依美国方案制订。历史迄今为我们显示国际秩序稳定仅有两条途径：一是大国主宰，一是权力平衡。我们既无主宰能力，主宰亦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念。因之，唯有回到美国历史上往常运用的权力均衡概念上去。而权力均衡的最主要原则是防止单一权力实体建立霸权；日本更是不甘心长期充当美国的小伙计，正在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而西欧国家联合、自主、自强的结果是欧共体的成立和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使用；俄罗斯也在竭力保住其大国地位，继续在国际问题上拥有较多发言权；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正在国际政治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上述情况均说明国际格局已由两极体制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

2. 各国均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彼此间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趋势日益明显。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摆脱落后、贫困，当务之急就是发展经济。世界上有 130 多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领土占世界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拥有大部分矿产资源，而经济却长期处于落后、拖欠外债的状况。如果不发展经济，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外债利率的提高，日子将会越来越难过。发达国家也纷纷调整产业结构，继续保持经济优势。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活动的活跃越来越走向全球化，无论在生产、贸易环节，还是在科技、金融领域，

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都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看重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原料和市场的依赖都在逐步加深，合作生产开发产品已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普遍方式。

3. 各国纷纷争夺科技优势，加大高科技开发投入。如前所述，各主要国家先后制定了以开发新技术为中心的科技政策，并且把它作为新的国家战略重要内容。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的国家，主要依靠劳力和资金来获取经济利益，而现在及今后则更倚重于科技进步。据统计，发达国家很多工业部门都是通过应用新的科技成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因为如此，各国都对高新技术十分关注，尤其是拥有较强经济基础的工业化国家，更对高新技术的开发投入巨大的智力和财力。从军事学角度来看，由常规武器到核武器（原子弹、氢弹），由洲际导弹的发射到建立攻防兼备的综合战略威慑系统，直至夺取太空军事优势，占领外层空间制高点，都离不开高新技术的发展。因此，争夺科技优势的较量是一场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竞争，其结果将关系到每个国家、地区或国家集团今后在世界上所处地位。

第三节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

一、亚太地区的战略形势

当前世界经济在朝向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呈现地区化发展的趋势。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近年来反复强调，目前世界经济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亚太地区将成为世

界经济的“火车头”，有人认为：“从 1775 ~ 1875 年是欧洲世纪，从 1875 ~ 1975 年是美洲世纪，从 1975 年以后是太平洋世纪”。客观上讲，由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的崛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东盟国家经济的腾飞，亚太地区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但是，与欧洲、美洲地区相比，我们认为亚太地区还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多中心的地区，还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紧密联系的合作中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左右整个亚太地区的形势发展。历史上遗留的边界、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使亚太地区的政治结构和力量组合变得尤为复杂。

美国并非亚太国家，却在亚太地区拥有最大影响力，这首先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值超过对欧洲的出口总值，贸易、投资比重仍在不断扩大。而从安全战略角度来看，美国既要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力量，特别是维持海上优势，以便遏制俄罗斯的举动，又要起到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还要牵制、控制日本的军备，防止出现以日本为主导的地区经济集团。总之，美国意在维持亚太地区现有均势，维护目前对美国有利的亚太秩序。同时，由于日益沉重的军费负担，美国又提出“合作性戒备”的新战略构想：“以美国为领导，以各种双边关系为基础，以共同防务能力为后盾的亚太安全体系”。要求日本这样的“有能力承担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的盟国，在共同防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见《国家与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年）

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是称雄亚太地区。具体表现为，近年来的日本历届政府都对“超级经济大